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程履绛传

胡卓然 著



刘亚生 (1910—1948)

邓泽达 (1875—1931)

李在生 (1905—1932)

孙晓梅 (1914—1943)

侯绍英 (1896—1927)

高文学 (1908—1931)

邓中夏 (1894—1933)

卢志英 (1918—1943)

郁瑞麟 (1904—1928)

顾一荣 (1898—1931)

顾一青 (1900—1931)

夏雨初 (1904—1930)

袁国平 (1906—1931)

朱杏牛 (1899—1932)

朱克清 (1895—1931)

丁一奇 (1910—1932)

冷少农 (1904—1932)

许色珩 (1900—1930)

施一德 (1900—1934)

邓佩珩 (1904—1943)

任天石 (1913—1948)

周 镜 (1909—1940)

陶家齐 (1896—1943)

恽代英 (1895—1931)

吴振鹏 (1906—1933)

何宝珍 (1902—1934)

徐楚光 (1909—1948)

陈子清 (1920—1948)

谢文德 (1894—1927)

陈君起 (1885—1927)

戚貽兴 (1927—1949)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程履绛传

胡卓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履绛传 / 胡卓然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12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ISBN 978-7-214-21644-1

I. ①程… II. ①胡… III. ①程履绛(1922-1949)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758 号

书 名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程履绛传

著 者	胡卓然
特 约 审 稿	陶炳才
责 任 编 辑	陈 颖 黄 山
特 约 编 辑	杨 溯
责 任 校 对	戴亦梁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8.25 插页 2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644-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子	/001	001
第一章 早期经历	/003	
家乡和家世	/003	
初次和南京结缘	/008	
离乡内迁	/017	
第二章 烽烟里的升学路	/029	
在大后方求学	/029	
升学的愿望	/040	
考取国立中央大学	/044	
第三章 从重庆到南京	/050	
入读中央大学	/050	
初到南京	/060	
阅读进步书籍 接受进步思想	/066	
第四章 投入斗争	/071	
最后一班轮船	/071	

追求“真和平”的洪流	/078
参加“四一”游行	/089
第五章 长眠于南京	/099
血洒总统府	/099
壮烈牺牲	/110
主要参考文献	/115
后记	/122

002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程履绛传





引 子

001

1950年4月2日,南京市大中专学生2.3万多人举行了送别、安葬一年之前在“四一”惨案里先后牺牲的程履绛、成贻宾两位烈士的活动。

4月2日下午1时,各校同学齐集在南京大学的草坪上,在烈士的灵前默哀。随后,南京市文工团奏挽歌、鸣炮号,2万多同学整队出发。每个同学胸前都佩戴了一朵白花。送葬队伍由军乐队、挽联、花圈、灵柩车、烈士家属及“四一”惨案里受伤的教授作前导,从成贤街经过珠江路、中山路、中山南路、中华路直趋雨花台,并在珠江路口、新街口、三山街口设奠举行了路祭仪式。一路上,学生们用扩音机广播“四一”惨案的经过和死难烈士的祭文。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道路“两旁群众均为悲壮的史实所感动,争先瞻仰死难烈士遗像,激起了对蒋匪特务的无限憎恨”。

长长的行列在人潮中缓慢通过,到雨花台时已是下午4时。各校

同学走近烈士墓地时,均稍作停留,向死难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烈士安葬仪式在下午4时30分开始。当时突然天降大雨,好像也寄托了人们的哀思。安葬仪式上,首先由乐队奏起《哀悼歌》,鸣炮后,人们将二位烈士的灵柩入土安葬。同学们及死难烈士家属纷纷铲土覆棺,并将花圈摆放到烈士墓前。

5时30分,两位烈士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安葬完毕。他们是雨花英烈中最后牺牲的烈士,倒在了南京城解放的前夕。

两名“四一”惨案烈士中,程履绎烈士是湖北人。他在家乡有父母双亲、弟弟妹妹,还有妻子和儿子。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长眠在了远离家乡的南京。





第一章

早期经历

003

家乡和家世

1922年，程履绛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老屋湾村。兄弟姐妹共有五人，他是家中长子。

应城县地处鄂中丘陵和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丘陵平原相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无霜期较长，夏季雨量较多，雨热同季。良好的自然条件让这里从5000多年前开始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孕育出灿烂的古文明。

而应城这个地名究竟来源于何处？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是：应城北负京山，南临竟沔，左达黄鄂，右挹荆潜，为安荆二府咽喉，郢襄东道门户，地处要冲，应置城为守。^①

^① 参见政协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应城文史》第25辑（上），第90页，2005年12月内部出版。

程履绛出生的老屋湾村,位于县城以东七八公里,是当时应城县境内诸多贫穷落后的村庄之一。

“湾”字意为河水的弯曲处。但是老屋湾并不位于一个水湾。村名上的这个“湾”字其实应该是“塆”字。“塆”字专指山地或坡地的弯曲地带,实际上是一个地名专用字,标示出其代表的地方“不在水里或水边,而是在陆地上”,同时,“此地不平不直但也不陡峭,是陆地上的弯曲地带”。而地名里带有“塆”字的村落,一般坐落于这样的地形里:“正面平缓,视野开阔,背后有山或山坡,两侧有缓丘相扶持。民间常称这种地形为椅子形。”在这种地形里选址建设村落,既不至于出村时翻越山坡要受崎岖之苦,又不至于让家园完全处于平地上而无险可守。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等省带有“塆”字的村落比比皆是,湖北省方言里把村庄也称为“村塆”,这反映了老百姓“对聚居地的选择理念”^①。

程履绛的家乡老屋湾村,是当地程氏村塆的“始居村”^②。村里原先有在清朝定居这一带地区的程氏家族先人建设的祖屋,故而得名为“老屋”。至今,村庄旁边仍有清朝时程氏家族祖辈的墓碑。



程履绛家乡老屋湾村今貌

① 李运富主编:《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35—136页,中华书局,2013。

② 应城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应城县地名志》,第156页,1981年10月内部出版。



老屋湾村坐落于一处缓坡的弯曲环抱处。村前有块一览无余的平原,村口还有一处小水塘。因为是家族的“始居村”,村子里居住着一个世代农耕的大家族。程履绎的爷爷程德迥和奶奶李氏,都是出生于1875年。他们24岁时生下大女儿程淑庄,30岁时才生下了程履绎的父亲程镇藩。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程镇藩结婚较早,娶了比自己大六岁的陈略思,开始自立门户的生活。1922年,程镇藩17岁时,他们的长子程履绎于当年9月3日出生了。^①

程氏家族的祖辈从清朝时期开垦田地,逐步积累下了家业。程德迥这一辈的老人盖起了多间瓦房。但是到了程镇藩这一辈,随着反动派残酷压榨下应城农村经济凋敝,几个堂兄弟成家时,仅仅可以在先人的大瓦房旁边用泥土夯成土坯房。

家里几个后辈的房前共用一片作晒场的小空地。晒粮食的时候,几家轮换着晒。穿过晒场进入大门后,是共用的厨房和养牛的牛棚。向前继续走,再穿过一个天井后,两边都是房子。其中一边是放粮食的粮仓,另一边即是各家分别居住的厢房。^②

程履绎就是出生于家族祖屋附近新建的土坯房里。他的童年,最初就在这个小村庄里度过。程履绎的家庭充满了和睦欢乐的气氛,多年后程履绎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用了“融融和乐”四个字来概

① 关于程履绎烈士的出生年份,不同史料有1919年、1921年、1922年等三类不同记录。1921年的说法实际上是依据程履绎“国立中央大学学籍表”里填写1943年入学和入学年龄22岁推断出的。然而,当时填写年龄多是虚岁。笔者从档案里查询到程履绎入读国立中央大学时填写“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生活调查表”时明确写下的出生年份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九月三日(原件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3411)。1919年9月3日这个日期,仅见于湖北省人民政府革命军人优抚处1951年4月3日给南京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园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寄来的材料(宁陵办收字第369号),收录入1951年11月9日“参加人民革命南京殉难烈士史绩调查表”。但是此记录里的出生年月日是程履绎父亲程镇藩1951年作为“代调查人”填写的。而1948年程镇藩填写“公务员眷属调查表”时,“直系家属”里长子程履绎年龄明确写的是26岁,对应是1922年出生(原件藏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LS31-2-0000320-010)。并且,程履绎1941年毕业于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巴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时,毕业成绩单上填写的年龄是19岁(原件藏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182000902700000010),同样对应是1922年出生。综合以上记录,可以确认程履绎是1922年9月3日出生的。

② 参见笔者对程履绎烈士妹妹程凭余的访问记录,2017年4月26日。

括,这蕴含了一个幸福家庭最美好的回忆。程履绛对于父母个性的回忆是“仁慈,任直觉”,对父母日常生活的回忆则是“日常生活勤俭”,^①这些回忆从不同角度勾勒出程履绛心里父母的美好形象。

亲戚们住得很近,平常可以多走动,彼此之间有急事也随时可以帮忙。而亲戚家的孩子们,也成为了程履绛小时候的玩伴。程履绛和这些伙伴们交情很好,后来随父亲到县城居住后,他还和幼时一些伙伴有往来,过年回到老家时继续一起玩耍。^②

虽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程德迥作为乡间较为开明的老人,在儿子程镇藩结婚成家以后仍供程镇藩读书,让他接受了中等教育。

学成之后,程镇藩成为当地一位思想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曾先后数年在应城县教育局^③担任股员,并且多次从事教师工作。^④

程履绛的父亲程镇藩从事教育工作的时期,应城县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辛亥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腐朽反动的政策、混战不断的时局,让中国各地哀鸿遍野。应城这片有过古老文明并且物产丰富的土地,在程履绛出生和成长的这个时代,也一直处在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里。

国民党的应城县政府,在其《县政报告》^⑤里面也不得不承认“本县农民生活情形,极其困难”。全县农民之中没有自己的土地,被迫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比例竟多达六成。而县域南部农民虽然种田之余还“以渔樵为副业”,但他们仍连一日三餐也确保不了,“工作时日食三餐,休息时只吃两餐”。

① 参见程履绛填写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生活调查表”,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48,案卷号 3411。

② 参见笔者对程履绛幼时一起玩耍的伙伴欧阳淑贞老人的访问记录,2017 年 1 月 23 日。

③ 参见湖北省政府民政厅 1934 年 7 月编《湖北县政概况》有关应城部分。

④ 本书有关程镇藩任职情况,主要依据 1948 年初国民政府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关于程镇藩任用审查结果以及他填写的职员记录卡、履历表等。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分别为:LS31-2-0355(2)-028、LS31-2-0000320-010、LS31-2-0000263-052。

⑤ 原书藏湖北省图书馆,无出版日期。从内容判断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县政概况。以下有关应城县社会黑暗的内容除有注释外的均引用自该书。





而应城县一旦遇到灾年，“人民均感疾苦”。洪灾和旱灾是应城常年遇到的灾害。应城县境内的河流“因应城县河窄小而弯曲过甚，接受安陆京山等处之水而注之襄河，每遇山洪暴发，消泄不及，常泛滥为灾，无法可以预防”；“汉川应城间之汧汉湖及府河口，接受襄河之水，倒灌而入内部为灾”。而应城境内大部分地区不处于滨湖地带，每逢夏季又多会遭遇旱灾：“本县除第三区所属滨湖之堤垸不畏旱灾外，其余各区，因地势较高，且乏湖沼，每遇七八月之间旱即成。”应城的老百姓只有年复一年在洪灾和旱灾之中备受煎熬，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而为当地带来滚滚财源的石膏业和盐业，被极少数资本家和封建矿主把持，并且仍普遍存在封建把头制度，“为一班工头所把持，俗称掌捍锤，有大工头、二工头、三工头等名称，形成阶级制度，待遇极不平等”。

石膏业和盐业带来的财富，通过残酷剥削被积聚到少数峒商手里，让应城并不像周边各县一样主要是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压迫，应城县境内同时存在资本家和封建矿主对于矿工的压迫。

社会的黑暗导致了文教事业的落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应城县“裹小脚”女性比例仍为约百分之四十，“乡村幼女，仍有缠足者”，这是民众思想愚昧的表现。而教育更是远远跟不上社会需求。

1934年7月湖北省民政厅编纂的《湖北县政概况》对应城县教育情况的统计显示：“就全县论，识字人数，尚不及百分之五”，“全县学龄儿童三万八千余人，在校学生总数不足三千名”。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落后，“社会教育，设施甚差”，民众教育馆“于社会教育无甚效果”。为攒教育经费而积累农作物的应城县“社田”，当时记录竟也“日久渐形废弛”。^①

不过，虽说当时应城县社会黑暗，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但程履绎的父亲程镇藩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意义，也很看重对于子女思想品德

^① 参见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编《湖北县政概况》，第721—723页，1934年7月内部出版。

方面的教育,他的儿女日后全接受了中等以上教育。平日里,程镇藩和妻子很注重勉励孩子们勤奋好学和刻苦上进,并要求孩子们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后踏上社会可以“独立不依靠人”。很值得一提的是,程镇藩对待女儿也像对待儿子一样,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踏上社会能有自己的事业。^①这在当时仍有给女儿“裹小脚”的愚昧风气的应城县,无疑是十分有远见的事。课堂上的知识开拓了程履绎的眼界,也让他慢慢了解到家乡之外的世界。

多年后,当程履绎踏入大学校门时,还可以清晰回忆起小学时期的教育主任名叫徐文辉,而“最可崇敬之教师”姓名是章国雄。^②小学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初次和南京结缘

程履绎出生之时,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而就在1922年6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也完全失败。在这样的历史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③

与此同时,中国的土地上正悄然孕育着革命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具体步骤的探讨,始于1922年。”^④

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① 参见笔者对程履绎烈士妹妹程凭余的访问记录,2017年4月26日。

② 参见程履绎填写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生活调查表”,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案卷号3411。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74—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④ 王桧林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第64页,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





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①。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进步思潮也逐步兴起。

程镇藩虽然有了一份稳定的政府职员职业,但是受到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一直有着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理想。对于应城县社会黑暗、文教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程镇藩不仅自己看不惯,对子女的教育中也会涉及“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②的理念。

在程履绎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渐渐亲眼看到了家乡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而父亲对于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批判,通过一步步言传身教,初步塑造出程履绎富有正义感、乐善好施的品格,并且在童年的程履绎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追求光明的种子。

1931年3月,程镇藩到应城县第一区第四初级小学(又名应城县立陈湾小学)担任教师。在此之前,发生了对程履绎以后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他的父亲程镇藩和共产党人结为好友,并且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当时,应城县教育界有两名回家乡隐蔽待命的共产党员:许子威和徐觉非(又名徐休祥)。他们二人都是应城本地人,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且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分校学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计划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但教导团赶到九江一带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许子威和徐觉非又随教导团南下广州。1927年12月11日,他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2月14日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子威和徐觉非随部队撤出广州。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东进海陆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29年,许子威和徐觉非被党组织安排回家乡应城县隐蔽待命。许子威回到家乡休养后,到应城县教育局担任股员,和程镇藩一度成为同事,后又到小学教书。徐觉非回了家乡后也在小学里担任教师,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② 参见笔者对程履绎烈士之子程常青的访问记录,2017年1月23日。

此掩护身份。

在这样的背景下,程镇藩和许子威、徐觉非结识,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①

1931年夏天,程镇藩告诉虚岁还不满10岁的程履绎:“爸爸马上去南京读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了。”

“南京?很远的地方吗?”

“不远,从武汉坐船,沿着长江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了。”

从此,程履绎心底深深记住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此时天真烂漫的程履绎不曾想到,十几年后他也会到南京这座城市读大学,并且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1907年,美国基督会将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又和宏育书院合并,成立了私立金陵大学。

农科是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科目,1914年创设,开中国四年制大学农业教育之先河。

19世纪中叶,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近代自然科学应用于农业,使传统农业发展为近代农业,形成农业科学和技术,并随之出现近代农业教育。金陵大学农科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课程配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同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1915年学校设立林科。1916年,北京农商部直属林业学校、青岛林业学校先后并入金陵大学。农、林两科随后合并,成为了农林科。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金陵大学农林科随之扩充为农学院。^②

金陵大学农学院附设的农业专修科“为二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

^① 程履绎烈士之子程常青2017年1月27日接受访问时告诉笔者,1963年春季他在应城二中读书,徐觉非老人到应城二中考察,了解到他身世后曾专门与他详谈。当时,徐觉非老人深情地向他回忆起与他的祖父程镇藩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关史实。

^② 参见《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历史沿革有关记述。



授以应用农科学,培养实际应用人才”^①,金陵大学曾“于1922年和1923年相继设立农业专修和乡村师范二科。教材专取实用,教学并重实习,以造就吃苦耐劳、能工能读的服务农村人才和真实乡村领袖,以谋中国农业根本的改良和农村彻底的革新”。1926年因时局而暂停后,社会各界呼吁重办。金陵大学响应社会呼吁,旋即又“将专修、师范二科恢复,合办为农村服务专修科(后改名为农业专修科)”^②。

从该科原本名称为“农村服务专修科”,可以看出其办学性质是为农村培养农林方面的技术人员。1927年“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组建时,其招收学生条件的前三条是:“一、生长乡村或深悉农村情形者;二、对于农业有浓厚兴趣并乐于农村生活者;三、有志服务乡村甘愿躬亲实行者。”^③

1931年上半年,应城县教育局计划用公费资助四名教师到南京金陵大学学习农林,毕业后“回本县分配工作”^④。同样都是应城县小学老师的许子威、徐觉非和程镇藩都在这次资助之列。^⑤他们都通过了入学考核,成为南京私立金陵大学的学生。

对于有了稳定工作和收入的程镇藩来说,选择放弃之前安逸的一切而学习现代农林知识,与他对应城县的社会现实不满有关。该县腐朽的国民党官僚们不重视农林业发展,任凭田地荒芜,也不植树造林,只是在《县政报告》里“叹惋”一句:“查本县西北一带,田地荒芜甚多……田多塘少,又无森林,一遇旱灾,无法救荫,殊为浩叹。”

程镇藩立志改变这个状况。1931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陈略思和儿子程履绎,顺江而下,赴南京就读。程履绎幼小的心灵里,也刻下了爸爸在南京的记忆。长江下游这个名叫南京的古都,成为了程履绎心里悄悄牵挂的地方。这其实也是程履绎初次和南京结缘。

①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9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② 参见郑林《现代化与农业创新路径的选择: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分析》,第16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③ 《农林新报》1927年4月21日。

④ 《百年诞辰纪念:许子威文集》,第25页,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华中农业大学,2008。

⑤ 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金陵大学档案对应城县资助他们三人入读有记录。

程镇藩刚刚到达南京的当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①

许子威、徐觉非和程镇藩刚刚在私立金陵大学开始学习,和同学们一起从各大报纸上看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天里,报纸上又披露了蒋介石继续下达“不抵抗”军令。1931年9月22日,《申报》报道里记录了此前一天(9月2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令:

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日本大举侵略东省事件,秉承中央意旨,严令所部,处以镇静,静候正当解决。昨特通令沪宁,沪杭两路沿线驻军,及驻沪部队等一体遵照办理。其大旨如下:(一)加紧警备区域内防范,严令部队避免与日人冲突,(二)严密保护日侨……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33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